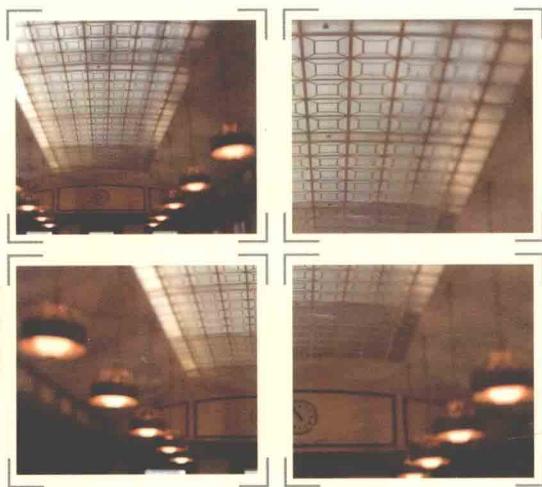


李欧梵作品



人文文本

建筑、阅读、音乐与记忆

你们这一代人，生于安逸，不知忧患是何物；而我这一代人，生于忧患，现在的生活也很安逸，但不能忘怀童年的忧患岁月。

人文文本

李欧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文本：建筑、阅读、音乐与记忆 / 李欧梵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李欧梵作品)
ISBN 978-7-02-008255-1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6615 号

特约策划：陶媛媛
责任编辑：肖潇雨
装帧设计：余笑乐

人文文本
李欧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5 千字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7.75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255-1

定价：29.00 元

献给和我一齐阅读人生文本的妻子——子玉

总序

李欧梵

我的写作生活不算长，至少比学术生活短得多。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赴美留学，在环境影响下用英文写学术论文，不觉已有半个世纪，直到最近十年，才着力用中文写作。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习作。

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称为“学者散文”，但没有解释，顾名思义，似乎指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写下来的随意而松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来有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称之为“Essay”，法文叫作“Essai”（有尝试之意），这两个传统不尽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强称之为“杂文”，但又缺乏鲁迅式的匕首投枪的作风。我从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评世界或人物——这一点“鲁迅风”我完全没有学到，虽然自己确曾研究过鲁迅。也许，对我而言，“生活”这个人文文本太丰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时代加上去，更像一座宝山。我每读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论中西，都觉得如在山

下掘宝，越挖越兴奋，越发感到高山仰止，灵光灿烂。个人最中意的小文都与这类读书报告有关，如《狐狸洞书话》。生活加读书，人生的意义足够了。

现在我的好友季进和黄育海、陈子善策划将这些中文作品和中译的学术著作，汇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为送给我的七十岁生日礼物，我却之不恭，只好笑纳。这个作品系列不代表什么写作成绩，只是一种生活和读书的感受与潜思的记录。这么多年积少成多，竟然有将近二十卷之多，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

除了某种纪念意义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义：这些参差不齐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一个文本的“整体”，有点太“重”了，似乎当年的“狐狸”变成了一个大“刺猬”。然而，我曾屡次提过，自己的文章绝对成不了系统，因为我的兴趣太广，在人文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岂能成为刺猬式的思想大师？我愧不敢当，只能说，这个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种积累，犹如重新发行的一套唱碟，希望价廉物美，消费者喜欢就好。

这个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趋多元的兴趣。回顾起来，糟杂之中也自有脉络可寻，总而言之，可以用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电影和建筑这几项人文科目来概括。我学的是历史和文学，但兴趣遍及其他各项，加起来看，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主义者。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文化的各种吊诡层面。我的时间范畴是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我游移的文化空间也遍及东西方。不知何故，近年来反而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和文化兴趣日增。别人可以在文化上落叶归根，我却不自觉地飘零四海，其乐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甚至把双语写作和阅读作为一种常态。

这个系列中的各书出版次序可能不会以写作先后为序，因此我必

须略作交待。如果把学术著作和杂文写作放在一起,很明显地可以归纳出一个轮廓:我是先从“五四”时期的浪漫精神出发,逐渐向不同的文化时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从“五四”走向一九三〇年代,而鲁迅研究则成为一个中介,他晚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觉对上海的都市文化产生兴趣,甚至为了摆脱鲁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欢的东西——十里洋场的摩登上海。我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股“反动”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为上海怀旧浪潮的标志之一,这更激发了我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我作品中的另一条空间脉络是香港和台湾。我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在美任教三十多年后,退休到了香港,目前则在港台两地游走。从地缘政治而言,我似乎地处边缘,我也故意采用一种“边缘视角”,别人——特别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心主义”知识分子——可能嗤之以鼻,我却甘之如饴,甚至以此自我定位。对我而言,边缘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我不受“中心”情结的牵制,可以随意转变视角,扩展视野,由中而西,由美而欧,甚至指向西欧的边缘小国如捷克(当然这也拜昆德拉所赐),近日兴趣又转向南美和南亚(如印度)文学,下一步可能是解放后的南非。总而言之,我认为只有处在边缘才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边缘视角也影响了我的思想内容。我的不少想法往往和“主流意识”不同,不见得是“对着干”,而是不自觉地另辟蹊径,走个人的道路。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是“灼见”(Insight),或创见,只能自嘲是“不按理出牌”的结果,对于学术理论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我在和季进、陈建华的两本对话录中都曾仔细地自我分析过,此处不赘。

我的另一面“不按理出牌”的表现是感情。一般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把自己藏在“客观”之中或隐于文本之外,我恰好相反,从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就感情外露,侵入研究的

对象，甚至自觉地另用散文形式去踏寻徐志摩的踪迹。这一股浪漫情绪，见诸我早年在台湾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多年来这股“余绪”一直支持着我的内心生活，终于在十年前我和子玉结婚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我们夫妇合写了三本书，而且我在人生进入老年之际，从子玉身上学到一个“真”字，因此也把一股真情用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之中，笔锋常带情感，文章到处可以看见主观的“我”，这也是一种风格和立场。当然，有时主观会导致偏见，我也在所不顾了。从“浪漫”到“偏见”——但并不偏激——这也许可以总结我的心路历程吧。

以上的这些自剖，其实都是多余的话，文章写完发表，有它独立的生命，应该听由其自生自灭，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这个作品系列，除了献给支持我写作的妻子外（连这篇小序也是今早她给我的灵感），也愿意献给所有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朋友。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于九龙塘

目 录

总序	1
文本建筑	
如何“解构”监狱？——有关香港中央警署的臆想	3
“形式”与“功能”	7
建筑变迁与时代变迁	11
沪港台都市文化与公共空间	15
建筑和权力	22
鸟巢属于全民——奥运新建筑探讨之一	26
奥运建筑物的对话——奥运新建筑探讨之二	30
“建筑”和“建筑物”——参加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感想	33
实验建筑只剩冰冷装置——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观摩之一	37
东亚的建筑创新与文化——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观摩之二	40
后现代灵感来自传统美学——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观摩之三	43
把时间具体化——谈建筑与文学	46
建筑与音乐的对话	49

文本阅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传奇	55
解画的艺术——试论《我的名字叫红》	58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岭南大学会 议上的发言	68
鲁迅与世界文学	81
人性和自觉——再谈印尼良心作家	86
余英时荣获人文诺贝尔奖	90
阅读吴鲁芹	94
奥巴马的“寻根”小说?	97
奥巴马的文采	101
西洋戏剧的改编艺术	104
阅读《奥赛罗》	108
从《老残游记》到《还魂香》和《梨花梦》	118
“万家之宝”——追忆曹禺	124
《游园惊梦》和《玫瑰骑士》	130
我和书的奇异约会——美国购书漫笔	136
我的阅读经验	142

文本电影

老电影指南	149
夏志清和刘别谦	156
神鬼无光——马丁·西科塞斯凭什么获奖?	161
英格玛·伯格曼 VS 安东尼奥尼——天堂的对话	165
漫谈海盗片	171
重访《苏丝黄的世界》	177
《职业特工队》追本溯源	182
吴宇森的《赤壁》	187
英雄的“本色”	193

文本记忆

战争反思录	201
奥运开幕式的反思	215
和斯坦福与伯克莱的缘分	219
母校新竹中学琐记	224
现代主义文学的追求——外文系求学读书记	233
我逃不出网络风暴	243
高丽大学的人文空间	247

三游首尔的文化之旅	251
听马英九就职演说有感	256
台湾 · 单车 · 风的味道	260
地震后的梦魇	263
西九文化区计划，岂止是愿景？	266
代后记（李子玉）	271

| 文本建筑 |

如何“解构”监狱? 有关香港中央警署的臆想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六日的《南华早报》刊载了一个消息：港岛的中央警署（又称旧中区警署）改建计划又有变更。这个方案是由香港马会赞助负责，蓝图由设计北京奥运体育馆的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与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公司设计，基本构想是保持原有建筑物，并改建成文化场所（如小音乐厅、展览馆、博物馆等）。备受争议的是那座高达七十七米的瞭望塔，据报载，附近居民有人认为会妨碍视野，于是马会遵循民意取消原计划，再请世界闻名的建筑大师拟定新计划。

我不知道这个建议的背后是否有历史的原因，也不禁想起中央警署本身的历史。中央警署和域多利监狱的建筑群，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建成了，它坐落于中环的半山正中央，山上是殖民统治者的高级住宅，山下则是华人聚居之处，界限分明。中央警署位居中央，居高临下，主要目的是监视山下的华人。当年的“警察总长”兼市长就是威

廉·坚 (William Caine)，“坚道”因他而得名，而附近俗称“长命斜”的奥卑利街 (Old Bailey Street) 显然是得自伦敦的同名法院、警署、监狱区。总而言之，这个历史上的中央警署绝对有统治和监视的象征意义。

英国有一位政治思想家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他曾在一七九一年草拟了一个新监狱的蓝图，叫作 Panopticon，或可译为全景监视型监狱，即在监狱中央盖一个全景瞭望塔，使监狱长或值日狱卒便于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而囚犯却看不到他。这个模式后来广受英美监狱采用，但那是二十世纪的事了。当年香港的维多利亚监狱仍用老式方法，即把犯人关在密密麻麻的小房间里，每幢牢房各有三四层，每层有狱卒负责监视。边沁自己说他的这种新牢房既省钱又省事——当然是从监视者的立场而言的，因此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他的一本专著中对此大做文章。福柯一向认为人是受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知识系谱和社会机制控制的，最具体的就是监狱和医院。

建筑大师赫尔佐格也许读过福柯和边沁，所以我猜原先设计的瞭望塔，说不定灵感就因此而来（也许我又是书呆子痴人说梦，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然而“瞭望”的不再是监狱犯人，而是维港美景。

这就牵涉到对于建筑物的诠释问题。我一向认为：建筑物，特别是坐标式的文物建筑，本身就负载了大量的文化意义，然而文物保护也不能食古不化、原封不动地保管，所以关键在于如何既传承又创新，为旧的建筑物赋以新的文化意义。两三年前，中央警署的改建问题就有争议：董建华时代将之交给旅游发展局，当然为了招揽游客，而反对此举的几个私人家族则希望保存这十几幢历史文物作为博物馆。现任特首曾荫权则将之交给马会全权处理，并不曾咨询立法会

或民意。好在马会（至少在我看来）处理得不错，没有请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一个大天篷，而是请了更有人文气息的赫尔佐格。我上网查看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公司提出的草案，发现这十几幢监牢和警署都会变成各种文化设施，外加三家餐饮店和三家商店，倒不失为一个可取的折衷方案。

这个原有的方案中也设计了较高的屋顶花园草地和一座瞭望塔，现在可能行不通了。《南华早报》的社论表示遗憾，认为如果建得好的话，未尝不会成为香港的一个新坐标。我基本同意这种看法，问题是：这个瞭望塔式的坐标的文化意义何在？如果又是盖一幢数十层的豪宅或酒店，在屋顶加上个瞭望塔，就毫无意义了。然而略有历史文化感的建筑师会问：边沁的原型是否可以“解构”？把原有的内部监视转为外向远眺？借此招揽游客，有何不可？对这个瞭望塔的设计，本来反对，但现在反而觉得未免可惜，为什么？

说来又像梦呓，因为我想到当年关在域多利监狱中的无数“长命斜”幽魂，他们一辈子未能“翻身”，关在小牢房中没有视野，说不定这些游魂也想上来看看？也许鬼魂上瞭望塔不必乘电梯，但普通居民和游客如何上得去？瞭望塔的设计可否新颖一点，不必盖在屋顶上，也不必太高，最好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通道，内装升降机，上达瞭望台，如此则不会妨碍其他高楼的观瞻。

于是我又想到福柯，甚至曾和几位学界朋友打趣地说：也许警署总部可以改成一个监狱博物馆，就叫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也是福柯理论书的原名，但内中的展览则与福柯的想像不同，应把诸如戴望舒等当年坐过牢的文人和志愿者资料陈列其中。我这个灵感一半得自福柯，另一半则得自东北的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本是日本人的监狱，内中陈列了甚多日本军人虐待中国烈士、囚